



《中国文化与亚洲·世界文化的共生》研究会总结报告

张 琢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惠泽四方，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尤其深远，中古以来甚至远播欧洲。亚洲各国既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亦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加以融合，各具特色。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各民族文化的勃兴与全球普世文化在互动中的俱进。这是作为全世界人口最集中、历史悠久而又处在经济、文化全面复兴、高涨中的亚洲文化共存、共荣、日益频繁交流的时代的文化现象。研究这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本研究会创办及活动的主旨。

本研究会的方式以召开大型国际研讨会为主、小型研讨会为辅，迄今已经召开三次大型研讨会、19次小型研讨会，今天召开的是第四次大型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成员主要有日本学者、中国学者、韩国学者、美国学者等。先后参与主持研讨会工作的主要成员为爱知大学教授张琢、周星、马场毅、副教授高明洁。同时，我们还以聘请国外学者来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学的方式，把研究成果传授给在校学习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

下面，简要回顾一下2003年、2004年、2005年召开的三次大型研讨会的讨论内容。

1. 第一次国际讨论会

召开日期：2003年11月1～3日

会议主题：新启蒙、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现代化论及后现代问题

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循序渐进地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带动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亦或先或后、或显或隐地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观念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1990年代末以来，围绕着“中国在经济上引进西方自由主义市场体制的同时是否也需要在政治上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各种场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会上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为题作了基调报告，他指出，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的突显，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三种不同思想价值趋向：第一种为知识分子中新右翼的观点，认为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第二种是自由中间派，认为只有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第三种观点即新左派，他们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萧功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论争的三种前景做了预测：第一种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第二种前景，是激进新左派与现代化过程中受损的下层绝望阶层相结合，发动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土地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阱。最后，他强调：中国虽然充满矛盾，但经济发展态势基本良好，出现现代化断裂的可能性不大，发生后两种趋势的概率并不高。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以《老革命的新觉醒》为题，对以《炎黄春秋》杂志为园地的中共党内的老革命家、理论家中的民主派的思想 and 政治动向做了介绍，她分析说：该杂志的不少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是中国政治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追随共产党，长期以来习惯以党的利益为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鲜有个人的自主意识。“文革”的浩劫和共产党的屡次失误，使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动摇、彷徨和重新找回自我，现在再度举起他们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帜，力求从体制内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人是共产党的补台派而非拆台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根底的情况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化、政治与经济搓揉下的中国现代化》。他认为，就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与19世纪的明清中国一样，当代中国推动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对18世纪以来的西方启蒙理性文明的一种反应，仍然是在既有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支撑下进行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开始于资产阶级借“平等自由”的口号向既有的主导政治势力争取“公平正义”，现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始于政治与经济势力的大结合，更恰当地说，是政治渗透经济，把后者纳入其既有的运作理路之中。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格中内涵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它势必促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而这又是贯彻公平正义所必须考虑的基础。

美国夏威夷大学周晓副教授在以《与国家的妥协：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为题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左翼和右翼均主动致力于把自己和历来作为国家附庸或批评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拼命与之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双方特别是左翼，又不得不作为国家的批评者而行动。她认为，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曾影响并重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已经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复归变得困难。但是她担心，新左翼人士大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左翼的影响，正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的威胁，或许会从根本上弱化市场经济之自由的基础。

神田外国语大学兴倡一郎教授以《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为题，对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争

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光是学术论争，它的背景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自由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建立宪政，实现言论与结社自由，实施多党制，保护私有财产。新左派则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带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倾向。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于何为原因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由主义者在一党专制中找原因，新左派则归因于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自由主义明确提出以实现宪政为目标，新左派除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外，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兴倡一郎明确指出，目前，妨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是“政治”，不解决“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很难持续发展。

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以《当代中国的“公正”与“正义”》为题，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线索，将这场论战分为1994年后、1997年后和1999年之后三个阶段。

爱知大学周星教授以《“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为题，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截至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面临着如何确立和提升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这一基本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将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研讨会开过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政治改革的方向”等争论白热化，由隐而显，参加讨论的文章从以网上刊载的方式发展为报刊杂志的公开登载，关心和参与讨论的人也从学界扩大到民众。一些具体的观点和内容，我将在分会讨论中予以介绍。

2. 第二次国际讨论会

召开日期：2004年10月9～10日

会议主题：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国民统合与文化多样性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内各个地域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入发展，同时，不同地域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在政府通过媒体和资讯等手段控制社会的力量空前增强的情况下，以国民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为指向的社会大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但是，人们的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依然顽强存在，并不断地通过文化等各种方式来寻求表达。这就是目前中国复杂而充满张力，丰富而又生机勃勃的多民族文化格局。

这次研讨会的主旨是着重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尝试接近和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向，聚焦于关注国民文化的建构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以《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为题作了基调研报告，他指出，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帝国或所有的世界体制大都是在追求统一、一致，都在致力于排斥异己和多样性，这样的历史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文化多样性也能够维持世界的和平。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政府在开发西部以改变少数民族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制定各种政策想方设法保护西部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尽管如此，在城市经济所推动的地区之间、族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很多传统因素会在这种互动中发生变异，甚至流失。目前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流失的状况加剧。第二、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人为的旅游设施建设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服务行业和游客造成的环境污染，文化项目开发中存在的猎奇取向等，都对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三、族际互动交流中的文化适应与摩擦。特别是随着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在逐步摆脱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应地也增强了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在城市生活和汉族群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某些传媒报道、文学描写、影视作品和生活接触中也存在猎奇、想像、曲解、甚至出现侮辱性的成分，由此引起的少数民族群体性、地区性反应明显增多。第四、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性取向问题。在汉族聚居地区，区域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强化了维护文化边界的观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维护强化着族群边界的意识。这两种取向在现代化文化整合的大背景下，又表现出分化的特点。这种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特点，一方面无法抗拒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又在努力维护和塑造地方的和族群的文化特征。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现代化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现象。

郝时远认为，中国当代的民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族际互动日益密切和广泛的时期，民族关系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内容也更加具体化和富有多样性，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整合时期。但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也会继续增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靠同质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要通过强化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来消弭矛盾。承认文化差异的目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强调各个文化类型的天然独立性。

此外，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横山广子副教授以对云南大理市农村白族的调查为例，分析了中国葬礼的改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爱知大学松冈正子教授根据对四川阿坝地区羌族的调查，考察了国家意图的“国民文化”与少数民族自身认知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分析了中国游牧文化的特征；台湾东华大学吴天泰教授介绍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实践；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及其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刘新、爱知大学教授周星、助教

授高明洁和铃木规夫分别对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作了考察。

3. 第三次国际讨论会

召开日期: 2005年12月2~4日

会议主题: 国家、宗教与文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被压迫生灵通过宗教而发出叹息,以缓解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所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即宗教在精神上起麻醉和安抚作用。列宁解释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名言,形成“鸦片基石论”,误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几代人,以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就是宗教鸦片论。列宁在“鸦片论”基础上还提出“斗争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在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过程中,也部分地受到“鸦片基石论”和“斗争论”的影响,一段时期曾用“左”的激进态度去对待宗教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宗教理论与政策重新回到理性的轨道,1979年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正式启动了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正视。

探讨中国的宗教现象,梳理中国的宗教理论与方法,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旨。会议由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有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16位学者提交了16篇学术论文或发言提纲,报告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于宗教史、宗教文化及思想史的研究;(2)关于宗教特点、民俗宗教与宗教政策的研究;(3)关于研究中国宗教现象的视角与方法。

(1)关于“宗教史、宗教文化及思想史”的报告,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现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在题为《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的报告中指出,元朝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要把藏传佛教提升到近似国教的地位,主要是想借助藏传佛教来保持蒙古文化本位,以便与汉地的汉文化形成抗衡,而正是元朝的这种宗教政策,历史性地导致了今天中国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并存关系。日本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在《近代中国和天主教本土化》中认为:西方列强庇护下的“保教权”运动导致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之间的隔阂,义和团运动后来到中国农村传教的雷鸣远神父为了消除这种隔阂,重新组建了较为重视中国教民主体性的教会组织“公教进行会”,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博士以《在宗教与政治之间》为题,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佛教革新运动以及两岸的佛教交流情况后,得出结论说: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大陆的佛教、台湾本土佛教和日本佛教之间其实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韩国鲜文大学吴在环教授在题为《〈大同书〉宗教思想的现代意义》的报告中,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及其提出的社会改革方

案中带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其中有些主张如男女平等、合约同居、社会福利等，已经在一些国家变成了现实。

(2) 关于“宗教特点、民俗宗教与宗教政策”的研究，主要揭示现代中国各种宗教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民俗宗教”属性，进而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国家宗教政策所存在的问题等。爱知大学高明洁助教授的论文《一神教本土化的合理性：以中国伊斯兰教为例》，集中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后形成的重要特点，如明清以来以儒学对伊斯兰教进行的再解释、本土语种穆斯林集团的形成、政治和宗教的“二元忠贞”、某种程度上与多神教（萨满教）的并存等等。她指出，对于真主和“天子”的二元忠贞，与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传统及其多重的认同意识，其实是一脉相通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哈全安教授在题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国家及中国伊斯兰教的非政治性》的报告指出，和世界其他的地区或国家相比较，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非暴力和民间性的特点，在世俗领域，中国穆斯林从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国家权力，政治倾向较为温和；虽然在历代官方“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下，伊斯兰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官方同时也对伊斯兰教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同时，中国穆斯林各教派之间的分歧，基本上也不是政治分歧。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以《近代国家与宗教镇压》为题，对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日本和中国宗教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民众参与，最终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家统合；后者的“破除迷信运动”则遭遇到民众抵抗，最终不得不有所妥协和变通。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在其报告《中元节的产生与盂兰盆节》中，基于他本人在台湾汉人社会的实地调查，对中国的中元节和日本的盂兰盆节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这两种节日以共同的信仰为背景，供养从地域里解放出来的亡灵，但在礼仪内容方面却分别以普渡和祖先祭祀为主，各有不同的倾向。这篇报告，实际上讨论了道教和佛教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渗透进民众生活的问题。爱知大学周星教授在《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的报告中认为，在具体的社区层面不能对民众生活中的不同宗教或信仰活动予以平等的保护，是现行中国的宗教政策需要改进的问题。他提出，不要把广大民众的各种民间信仰视为“迷信”，而应该将其看作是和所谓“普遍宗教”或“世界宗教”具有同等意义的“民俗宗教”，进而在国家的宗教政策中增加“民俗宗教”的分类，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民众信仰生活提供合法的保护。

(3) 对于“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视角与方法”的考察，集中讨论了如何理解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整体性以及研究中国宗教现象的方法论问题。首都大学东京渡边欣雄教授在《作为“术”（手段）的宗教》的报告中指出，仅从西方的宗教观出发，无法理解扎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民俗宗教现象，如萨满教、风水等等。但是从宗教行为体系这一角度去观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生活，则可以发现中国的宗教职业者都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共同体系中以不同的手段开展其宗教活动的，中国人将这种手段称作“术”。他试图在西方的宗教观之外对宗教做出新的定义，认为作为“术”的宗教不仅不是“非宗教”，甚至还可能是更具有“普遍性”的

宗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理查德·麦迪逊(Richard Madsen)教授在题为《更恰当地理解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方法论》的报告中指出,从欧洲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宗教研究和中国的现实之间缺乏对话,由于中国知识界和政府已经接受了宗教研究的欧洲模式,这就使得他们常常难以了解自身社会,有时导致悲剧性的后果。西方及亚洲的学者只有从中国历史入手,而不仅仅是以西方既定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宗教现象,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颖、更合理的解释方式,来理解现代世界之中的神性与世俗性的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在题为《建立中国学之宗教问题的思考》的报告中,分析了梁漱溟关于儒学“似宗教非宗教”的论断,认为在面临着信仰危机的今天,中国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儒学立为如同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国教,但是可以充分发挥儒学“似宗教”的一面的,以安定人们的情志。加强对儒学的“宗教精神”的研究,也是建设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由于本研究会爱知大学校内的主要成员和所邀请的校外专家多为从事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所以研讨会及学术报告的题目也多为此方面的内容。如前所述,一方面,本研讨会迄今讨论的内容已相当广泛,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文化领域尚未涉及到。如何兼顾“点”与“面”的关系,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望各方专家不吝赐教。